

## 敦煌遗书对“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启示

林世田 赵洪雅

**内容摘要:**敦煌遗书被誉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自其发现至今,我国古籍保护工作者围绕敦煌遗书的原生性和再生性保护做了大量工作,并由此助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诞生。这是我国历史上首个由政府主持开展的古籍保护领域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从敦煌遗书修复实践中提炼总结出的修复原则已成为目前我国最通行的古籍修复原则。海外敦煌遗书的数字化回归及国际敦煌项目(IDP)的建设也为未来海内外存藏的中国古籍数字化工作指明新的方向。敦煌文献中记载的十世纪中期三界寺道真和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修经事业,也予以后世古籍保护者激励和启示。

**关键词:**敦煌遗书 古籍保护 修复 数字化 海外回归

自1910年敦煌遗书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以来,百馀年间,国家图书馆对敦煌遗书进行了编目整理、缩微复制、影印出版、数字化、书库建设、保护修复等一系列工作,推动了敦煌遗书的保护、研究和利用。在此过程中,也助推了我国历史上首个由政府主持开展的古籍保护领域国家级重要文化工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诞生,丰富并发展了传统古籍修复的理念与技艺,为古籍数字化及海外流散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回归和保护指明了新的方向。早在2008年,张志清在《敦煌遗书保护与“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sup>①</sup>一文中已指出,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保护和修复,经历了一个从经验走向科学的过程。十年之后,我们在此基础上重新回顾“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发展变革,仍能从敦煌遗书中得到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sup>①</sup>张志清:《敦煌遗书保护与“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古籍保护新探索》,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21页。

## 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发端于敦煌遗书的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主持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工程。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实施以来，十多年来，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者围绕“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总方针，在古籍普查、文献修复、书库建设、人才培养、数字化、整理出版等方面不懈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而国家图书馆正是在总结敦煌遗书多年来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才逐渐形成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书库建设、修复原则、海外回归、古籍数字化等几个重大方面的设想和规划，由此开启了这一全国范围内古籍保护的重大工程。

敦煌遗书发现于1900年。在当时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政府积贫积弱的历史背景下，敦煌遗书被列强劫掠至世界各地，惨遭流离失所的命运。正如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所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上世纪80年代，国际敦煌学界曾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日本”的说法，尽管后来证明这是一种误传，但却让中国学者受到强烈刺激<sup>①</sup>。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敦煌学者焚膏继晷、急起直追，在80年代末，我国敦煌学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已经赶上并在某些领域超越了日本。季羡林先生在1988年北京召开的世界敦煌学会议上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得到了世界敦煌学界的普遍认同。中国的敦煌学，作为现代学术界中的一支新兴学科力量，终于在全球学术界站稳脚跟。

与之相较，作为敦煌学研究根基的敦煌遗书的实体保护能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仍是摆在我国古籍收藏机构面前的一个重大考验。事实上也是，在长达近70年的时间里，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存放在上世纪30年代善本南迁时使用的几十个木质战备箱中，层层叠压、拥挤不堪，既不利于保护，也不便于使用。为改变现状，2002年，国家图书馆向中央财政申请350万元专款，投入到敦煌遗书新库房的建设当中，并于2004年正式落成启用。敦煌遗书特藏库从根本上改变了敦煌遗书的保存条件：144个楠木书柜整齐排列，纤尘不染；每个楠木柜放置120个楠木盒；楠木盒底板采用樟木制成，防虫防潮。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下，16000余号敦煌遗书终于结束了百多年来颠沛流离、无处安身的悲惨命运——在敦煌遗书特藏库中，它们得到了最妥善的保护。更为可喜的是，敦煌遗书特藏库的建成，不但改善了敦煌遗书的存藏条件，还使国家图书馆另外两大专藏《赵城金藏》和《永乐大典》也得到有效保护，并引起国家和社会各界对国家图书馆保存条件的高度重视。此后，国家财政部逐年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文献修复进度逐年加快，保存保护条件得到稳步改善。

<sup>①</sup>刘进宝：《敦煌学史上的一段学术公案》，《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186—188页。

敦煌遗书特藏库的落成,让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工作者们萌生了一个更加雄伟的设想,存藏于中华大地上数以千万册计的古籍文献,是否都能够像敦煌遗书一样得到妥善安置和精心照料?流散于世界各地的华夏典籍是否还有希望以各种形式重归故里?一张更加系统、庞大的蓝图已在筹备酝酿当中——“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这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工程即将横空出世。

## 二、古籍修复原则源于敦煌遗书修复经验的总结

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6000余号敦煌遗书中,有相当数量的卷子存在破损现象。破损较严重的卷子,纸张已经老化,一触即碎,到了完全不能展开阅读的地步。有的卷子曾被泥土、油(古人使用的灯油或蜡油)、水浸泡,变得脆硬、糟朽。每展阅一次,常常掉下来碎渣、碎片<sup>①</sup>。

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图书馆开始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敦煌遗书的修复探索,老一代文献学专家冀淑英先生、敦煌学专家方广锠<sup>②</sup>先生和修复专家杜伟生<sup>③</sup>老师等人,吸收古今中外的文献修复经验,经过多次试验,系统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修复原则。一些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古籍修复原则,如“抢救为主,治病为辅”、“整旧如旧”、“过程可逆”等,都来源于敦煌遗书修复经验的总结提升<sup>④</sup>:

(一)抢救为主,治病为辅:国家图书馆老一辈版本目录学家冀淑英先生在指导修复敦煌遗书的过程中,最早提出了“抢救为主,治病为辅”的原则。冀先生认为,对敦煌遗书的修复,要突出重点,抢救那些影响寿命、必须修复的地方,对破损不严重的地方尽量不动,以保持敦煌遗书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不受损失。由此,敦煌遗书修复方案明确了以“局部修补”为核心的全新修复方法。这一方案成为指导敦煌遗书修复工作的重要原则,并逐渐为英法等国修复敦煌遗书时所效法。这与文物领域“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总方针也相契合。

(二)整旧如旧:“整旧如旧”的方式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一书中就有过表述。这里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要恢复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而是尽可能保持修复前的原貌,在修复工作中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它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我国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原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赵万里先生在50年代初修复《赵城金藏》时即建议采用这种方法,他说:“过去本馆装修的观点是将每一书完全

①张平:《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修复与保护》,《古籍保护新探索》,第182—188页。

②方广锠:《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遗书·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③杜伟生:《敦煌遗书的修复》,《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3—47页。

④张志清:《敦煌遗书保护与“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古籍保护新探索》,第15—21页。

改为新装，此办法始而觉得很好，其后则发现它不对。一本书有它的时代背景，所以决定不再改装，以保持原样。”<sup>①</sup>同一时期，梁思成先生在修复古代建筑时也提出“整旧如旧”的理念。

(三)过程可逆：我国传统修复方法大多没有考虑到可逆性，如目前国家图书馆保存的1703部宋元善本，大部分都由后人做了改装。一些善本由蝴蝶装或包背装被改为线装，有些还被裁去天头地脚，使后人失去了研究古代书籍独特装帧形式的可能。过去流落民间的一些敦煌遗书采用了通卷托裱的方式，虽然美观，但却使后人无法看到纸背的信息；西方国家在修复时还曾使用过化学胶水、加膜加网等不可逆的方法，自称为“善意的破坏”。国家图书馆在修复敦煌遗书时，不再采用传统的通卷托裱方式，最大限度地遵循“过程可逆”原则，确保现在的修复不会对原卷形态造成任何不可逆转的变化。如果将来有更好的修复技术出现，便可随时恢复修复之前的状态，改用更为先进的技术，以更好地保护这些遗书。

除此之外，文物保护领域后来提出的“最少干预”原则也在实际修复敦煌遗书的过程中得到了贯彻。不论使用什么修复方法和材料，都会或多或少地改变古籍的原有形态，损害古籍的文物价值。“最少干预”原则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修复行为，做到既充分保证原卷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不再损坏，保障研究者的使用与保管者的管理；又尽量少修，保留原卷的各种研究信息。

上述修复原则与方法的提出，在世界范围的敦煌遗书修复工作中尚属首次。如果回顾世界修复史，即会发现，国家图书馆从敦煌遗书修复中总结出的这些原则，充分吸收1964年诞生的《威尼斯宪章》的理念。1964年5月31日，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通过决议，提出了具体的文物修复原则，包括“最少干预原则”、“可逆性原则”、“可兼容性原则”、“可辨识性原则”等，为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科学基础，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敦煌遗书的修复原则启示我们，一方面，要在实践中将中国传统修复的指导思想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全面总结；另一方面，也要开拓国际视野，“吸收外来，不忘本来”——中外合璧，是目前中国古籍修复最通行的指导思想。

### 三、敦煌遗书的流散与“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

据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初步调查，海外存藏的中华古籍约有300多万册。其中既有正常渠道流传到海外的，也有在中国国运衰落、列强环伺、烽烟四起时被劫掠至海外的——这其中以敦煌遗书最具代表性。

光绪二十六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云游到敦煌莫高窟

<sup>①</sup>北京图书馆：《〈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北京图书馆档案文献史料汇编(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78—485页。

的道士王圆箓(1850—1931)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封闭近900年之久的莫高窟藏经洞,6万馀号四至十一世纪的珍贵写本、印本、拓本文献等重见天日。然而,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注定了其多舛的命运。1907年至1915年,英、法、日、俄等国考察队、探险家纷至沓来,加之清政府腐败无能、当地政府失于职守,致使王道士和一些地方官员盗卖经卷,最终铸成了藏经洞文献、文物四处流散的命运,至今仍令人扼腕叹息。郑振铎先生在面对中华古籍的流散时,也曾有“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的悲慨。

1909年,在罗振玉等人的呼吁下,诸多先贤多方奔走,倾注全力,呼吁清廷将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劫余的敦煌遗书辇来京师,入藏京师图书馆。经历了沿途大小官员监守自盗等重重灾难后,劫后的敦煌遗书终于在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得到了理想的栖身之所。新中国成立后,经由政府调拨、私家捐赠和本馆采访,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已达16579号,写卷长度为世界各大藏家之首,约占总数的40%,成为世界上收藏敦煌遗书最丰富的单位之一。

针对敦煌遗书大量流散海外的现状,作为国内敦煌遗书最大的收藏单位,国家图书馆理应肩负起推动海外敦煌遗书以各种形式回归的历史使命。实际上,近百年来,我国政府、各文化机构及爱国志士一直不懈努力,倾力从事海外流散敦煌遗书的调查与整理刊布,采取多种方式争取流散遗书回归故土。早在1934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便委派王重民、向达两位先生远赴英法两国,拍摄了1.3万馀张敦煌遗书的照片,为此后我国的敦煌学发展储备了宝贵的研究资料。此后,1957年、1979年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与英国、法国交换敦煌遗书胶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些交换得来的缩微胶卷是我国学术界开展敦煌学研究的主要资料。20世纪90年代,经国内学术界、出版界的不懈努力,相继出版了英、法、俄所藏敦煌文献,海外流散的大部分敦煌遗书均已以图版形式刊布。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图书馆积极参与敦煌遗书数字化的国际合作项目IDP(国际敦煌项目),运用统一的平台发布散藏在世界各地的敦煌遗书的高清晰图像,以便利学者开展研究<sup>①</sup>。

2002年5月,由中国政府出资,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实施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正式启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与大英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IDP)展开联络,积极谋求合作,最终,大英图书馆授权国家图书馆将馆藏唐咸通九年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收入中华再造善本一期工程。这一代表性文献的出版,为之后开展海外善本再造工作提供了成功范例。

2007年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有关单位和机构要对海外收藏的中华古籍

<sup>①</sup>林世田、萨仁高娃:《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资源库的建设》,《敦煌学知识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5—42页。

进行登记、建档工作”。对中华古籍的保护,尤其对流散在海外的中华古籍的保护,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为此,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于2014年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框架下,设立“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通过多种方式调查海外中华古籍存藏情况,以数字化方式推动海外中华古籍数字资源库建设和影印出版,使海外中华古籍为大众所享、为学界所用。

2015年4月28日,中法两国国家图书馆签署《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协议》,在文献数字化、人员交流及培训、合作出版等领域开展合作。同时,法国国家图书馆还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捐赠了《圆明园四十景图》的数字版本。《圆明园四十景图》为清乾隆年间宫廷画师根据圆明园实景绘制的绢本彩色作品,包含了圆明园40处代表性园林景观,是我国工笔彩画的代表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该图原存于圆明园,1860年被英法联军抢掠,现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是我国流散海外的标志性文物。《圆明园四十景图》的数字化回归,是“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实施以来取得的重要成果,为此后该项目的顺利实施拉开序幕。

随后,法国国家图书馆又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达成新的合作意向,由法国国家图书馆向中国国家图书馆赠送馆藏全部敦煌遗书的高清数字资源,包括汉文文献2700余号、藏文文献4000余号,此外还有梵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希伯来文等文种的珍贵文献。其中如存世最早的拓本文献唐太宗《温泉铭》(P.4508)、欧阳询《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P.4510)、《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等,历来备受敦煌学研究的重视。在双方共同努力下,2018年2月28日,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数字资源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的“中华古籍资源库”中正式发布,实现了这批敦煌遗书的数字化回归。

据有关部门调查,除敦煌、黑水城等专门的文献外,海外回归的中华古籍仅大型影印丛刊就有50多种,涉及4000多种古籍。国家图书馆设立“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后,也得到很多海外收藏机构的积极回应,为海外中华典籍的回归营造了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

回顾历史,敦煌遗书的流散与20世纪初我国积贫积弱的国运不无关系。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平稳迅速,综合国力稳步上升,文化事业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广大古籍工作者正在抓住这一机遇,通过多种途径,推动并实现海外流散古籍的回归,为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努力完成历史与时代所赋予的光荣使命。

#### 四、从国际敦煌项目(IDP)中汲取古籍数字化建设经验

古籍数字化作为保护与传承珍贵古籍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真实、清晰地反映古籍原貌,并借助互联网等媒介提供大众使用。数字化不仅极大地促

进了古籍资源的传播,还开创了古籍资源共建共享的服务新模式,使古籍原件得到长期保存和妥善保护,有效地解决了保护与利用间的矛盾。在统筹规划、标准建设和数据发布等方面,我国未来的古籍数字化建设工作可以从国际敦煌项目中获得有益的借鉴。

随着国内外敦煌写卷的相继公布以及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学者们希望充分利用敦煌遗书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末,敦煌学研究中存在三个突出问题。首先,收集整理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和起点。但由于敦煌遗书分藏世界各地,一般学者很难全部看到,使得研究工作受到很大的局限。第二,当时大规模的图录尚未出版,研究主要依赖缩微胶卷进行,但限于拍摄时的技术条件,许多写卷影像不清;且由于缺乏敦煌学专家的指导,很多胶片上漏掉了重要的研究信息,无法满足学者研究的需要。第三,敦煌遗书需要永久的保存与保护,为避免原件受损,应尽量减少流通,这就造成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

为解决上述问题,世界各收藏单位开始考虑如何在不影响读者服务的基础上,采用更先进的手段保存、保护敦煌文献,同时让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珠联璧合,以便于学界研究。在此背景下,国际敦煌项目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简称IDP)应运而生。1993年10月,中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新德里国立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等相关收藏机构共同倡议成立国际敦煌项目。1997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与大英图书馆磋商,2001年3月,签订双方合作谅解备忘录,开始IDP项目合作。2002年, IDP中文网站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正式开通。

国际敦煌项目的宗旨是将全世界现存的敦煌遗书及丝绸之路沿线遗址出土的文献数字化,通过统一的数据采集标准(标尺摆放、色标使用、图像分辨率等)、统一的著录规则、统一的数据库、统一的发布平台、统一的检索系统,免费提供学术界使用,使世界各地的学者可以从任何地点、在任何时间通过统一的平台检索到散藏世界各地的敦煌遗书。

为确保参与机构的知识产权,国际敦煌项目特别强调各收藏机构所做的图像和数据版权归制作者所有,任何一方不得复制其他机构的图像和数据,任何一方不得修改和删除其他机构的数据。这一理念得到各参与机构的认同。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目前IDP网站已经拥有8个中心,维护着中、英、法、日、德、俄等7种文字的网站和数据库,敦煌写卷全文影像总量约53万拍,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卷影像已达18万拍。

为使学者们看到与原卷一样逼真的图像,项目使用专门设计的数据库,用最精密的数码扫描设备将敦煌写卷制成高清图像。图像展示写卷的全部

内容,包括正面、背面,甚至没有文字的部分,其清晰度与原卷没有区别。图像放大之后,还可以观察到过去用普通放大镜不易观察到的字迹细部、墨色层次、纸张纤维等。学者在查阅敦煌文献时既不必再有舟车劳顿之苦,也无需接触珍贵又易损的原卷,完美解决了保护与研究之间的矛盾<sup>①</sup>。也正因如此,国际敦煌项目被誉为古籍数字化的典范。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依托丰富馆藏,积极开展古籍数字化工作,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目前,“中华古籍资源库”在线发布古籍资源超过3.2万部,国家图书馆超过60%的古籍善本资源实现了在线阅览。此外,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积极建设各类特藏资源库,包括甲骨世界、碑帖菁华、敦煌遗珍、西夏碎金、数字方志、宋人文集等各类文献超过22万部/种。同时,积极推动古籍数字资源的发布共享工作,先后联合全国其他21家古籍收藏机构举办3次联合发布活动,在线发布古籍资源约1.7万部,赢得社会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但不容忽视的是,古籍数字化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缺乏统一规划,重复建设严重:中华古籍数量庞大,分藏世界各地,国内大约有3000万册件,海外约有300万册件,如加上民国线装书,总数多达5000余万册件。但从总体上看,古籍数字化建设缺乏统一的、全局性的规划,各收藏机构都是按照自身需要开展古籍数字化工作,缺乏政府机构或行业组织的统筹协调,机构之间信息不通畅,多个机构重复建设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缺乏统一标准,资源共享存在障碍:在元数据制作上,各单位在著录格式、数据格式、著录项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无法直接进行数据交换,即便今后能将这些数据汇入统一的数据库进行检索或跨库检索,也会给读者的使用带来诸多不便,无法真正实现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共享。另一方面,古籍影像的采集标准,如标尺摆放、色标使用、图像分辨率高低等也缺乏统一标准,致使核心技术参数要求不一致。

(三)无统一发布平台,不利用户查询:由于没有一个全国性跨行业的协调机构,古籍数字化成果没有建设统一的发布平台,各单位、各系统按照自己的规则发布,存在光盘版、网络版、局域网发布等各种方式。虽然已有大量古籍数字化产品,但读者能够看到的却不多。

以国际敦煌项目为蓝本,建议未来的古籍数字化建设,需要(1)制定长远的统一规划,整合现有古籍数字资源,建设“中华古籍资源总库”,做好古籍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2)加快古籍数字化相关标准的研制,推进建立统一的古籍数字化标准规范和体系,严格数字化流程,保证数字资源质量;(3)建立统

<sup>①</sup>林世田、孙利平:《IDP项目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数字化》,《国家图书馆学刊》2003年第1期,第26—31页。

一发布平台、统一检索系统,在保证各收藏机构数字资源安全的基础上,不断加大古籍数字资源的发布共享力度,切实满足全社会对古籍数字化资源利用的需求。

## 五、道真补经对古籍修复的启示

华夏典籍在漫长又剧烈的历史变革中,经历了无数次兵燹水火、鼠啮虫咬、焚籍毁版、千里播迁,留存于世间的典籍已百不存一。这些古籍能够留存至今,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像敦煌道真和尚一样的默默无闻的古籍修复师。研究道真和尚修复佛经的历史,不但能为今天的古籍保护事业提供借鉴,而且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藏经洞的来源和性质。

目前对藏经洞性质的解释主要有废弃说和避难说两种说法<sup>①</sup>。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认为藏经洞的性质与道真修复古坏佛经有关<sup>②</sup>。佛教在敦煌地区极为昌盛,且佛教界认为修复残破佛经有非常大的功德,即所谓“造新不如修故”。在这种功德观念影响下,可以说历史上敦煌写经的修复是一直持续不断的。据荣新江<sup>③</sup>教授推断,藏经洞原本是归义军初期的河西都僧统洪辩坐禅修行的禅窟,他圆寂后成为纪念他的影堂。60多年后,纪念窟失去原有的功能,成为道真收集残破佛经、修补佛经的储藏所。经道真收集、整理、修复的三界寺藏经,一部分存入藏经洞,得以保存至今。

根据对国家图书馆所藏3000余号敦煌遗书的初步调查,在横跨七个世纪之久的敦煌写经中,大约三分之一都在古代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复。从这个角度来看,敦煌藏经洞的文献是研究古代修复的最好资料。

在敦煌古代众多的修复者中,最有影响的就是道真和尚。他是五代宋初敦煌三界寺的一位管理佛经的僧人,后来任职沙州僧政,987年迁都僧录,成为高级僧官。他曾主持敦煌戒坛长达20余年,作为归义军的使节出使各地,并主持三界寺藏经的收集、修复、重建等工作。公元900年前后,甘州回鹘曾攻打敦煌,三界寺及藏经均在战火中被毁。905年,三界寺开始重建,并开始了漫长的藏经重建工作。因为三界寺是一个小寺院,经费不足,道真所修补

<sup>①</sup>林世田、杨学勇、刘波:《敦煌佛典的流通与改造》,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2-22页。

<sup>②</sup>施萍婷:《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经》,《(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8-210页。

<sup>③</sup>荣新江:《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48页;后收入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5-95页。荣新江:《再论敦煌藏经洞的宝藏——三界寺与藏经洞》,《敦煌学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28页。

的古坏经文应是三界寺藏经的重要来源<sup>①</sup>。

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不少道真修复佛经的资料,国家图书馆藏《佛说佛名经第十三》卷尾有道真19岁时的修经记录:“沙门道真修此经,年十九,浴(俗)性(姓)张氏。”这里透露了道真俗姓张,张氏是敦煌的大族,说明道真可能出身名门,这对他的修经事业可能起到一定的影响。

长兴五年(934)道真曾发起修复藏经的活动,这一活动在敦煌遗书中有比较完整的反映。敦煌研究院藏0345号《三界寺应有藏内经论目录》是道真和尚整理的三界寺原有藏经所编草目,“应有藏内经论,见为目录”,并注明“此录不定”。目录中的发愿文留下了这次修复藏经活动的真实记录:“长兴五年岁次甲午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帙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弘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国家图书馆所藏《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目录》,是道真和尚寻访与修复后三界寺所藏藏经目录的定稿,著录经数远超敦煌研究院所藏草稿,可以看出定稿和草稿间的发展演变。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S.3624《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经目录》则是道真寻访、修复后的藏经目录的誊抄本,字体端庄,格式井然,然而非常可惜,仅残存21行。

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S.5663《中论》卷二题记中:“乙未年(清泰二年,935)正月十五日三界寺修《大般若经》兼内道场课念沙门道真,兼修诸经十一部,兼写《报恩经》一部,兼写《大佛名经》一部。道真发心造《大般若(经)》帙六十个,并是锦绯绵绫俱全;造银番(幡)伍拾口,并施入三界寺……道真修《大般若》壹部,修诸经十三部,番二七口,铜令(铃)、香卢(炉)壹,香兼(慊)壹,经案壹,经藏一口,经布一条,花毡壹,以上施入经藏供养。”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S.6225正面是佛经目录,背面有“三界寺比丘道真诸方求觅诸经,随得杂经录记”题记,说明这是道真寻访、修复的佛经目录。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道真在934、935两年中,也就是在他19、20岁这两年,整理、寻访、修复三界寺藏经166部,特别是把600卷的《大般若经》整理、寻访、修复成足本,而且还抄写了《大方便佛报恩经》《佛名经》,如果没有精进勇猛、为法忘躯的精神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大般若经》在敦煌遗书中占非常大的比例,且里面有很多残经。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P.3884卷背中有道真清点《大般若经》的记录。这些《大般若经》很有可能就是道真收集来的<sup>②</sup>。

此外,荣新江教授通过对斯坦因首次进洞的相关记录和照片的考察,认

①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三界寺藏经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12-17页。

②林世田:《敦煌文化的脊梁:道真补经》,《敦煌遗书研究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236-241页。

为藏经洞汉藏文佛典是分帙整齐存放的，其他文字材料和绘画也都分类包在一起。从现存敦煌绢画、佛经的古人修复情形，推断藏经洞所存已经“不堪受用”的佛像幡画、古坏残经，它们等待的是修复而不是废弃。斯坦因“杂包裹”中的残经废纸、木轴引首、经帙残片及丝带等，均是作为修补佛经、经帙、绢画的材料而保存在藏经洞的。从已发现的道真相关文献来看，道真的修经事业应不迟于后唐长兴五年（934），而敦煌文献中提到道真的文献，最晚的纪年是宋雍熙四年（987），故而推测道真的修补工作至少应当延续到十世纪80年代，且在担任释门僧政后，他很可能安排一些弟子继续他的佛经修补工作<sup>①</sup>。

实际上，古代僧徒信众的修经、护经行为并非道真独有。唐代诗人白居易即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在“儒学之外，尤通释典”，晚年在香山寺结香火社，自号“香山居士”。因香山寺年久失修，白居易便将大和六年（832）为元稹撰写墓志所得润笔费，作为修缮香山寺之用。八年后的开成五年（840）九月，年近七旬的白居易不顾身患疾病，又促成香山寺建成经藏堂，并写下《香山寺新修经藏堂记》<sup>②</sup>记录这一盛举。他深深有感于香山寺“有佛像，有僧徒，而无经典。寂寥精舍，不闻法音，三宝阙一，我愿未满”，于是“于诸寺藏外杂收经中，得遗编坠轴者数百卷帙，以《开元经录》按而校之。于是绝者续之，亡者补之，稽诸藏目，名数乃足，合是新旧大小乘经律论集，凡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护焉”。唐人修经、护经之盛由此可见一斑，而道真在敦煌三界寺半个多世纪的修经事业，也无疑延续了一代代僧俗对佛经的守护和传续。

敦煌遗书既是华夏多元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我国文献修复史、数字化回归史的一根标杆。古代修复师、爱国先贤和现当代仁人志士为敦煌遗书的保存、修复、回归和数字化建设付出了卓绝的努力，并在此过程中总结出科学的古籍修复原则方法，催生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诞生，其体现出的共建共享精神与热忱忘我的文献保护精神，也将不断激励古籍保护工作者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赵文友先生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作者简介】林世田，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敦煌学、古籍保护。赵洪雅，国家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文献学。

①林世田、张平、赵大莹：《国家图书馆所藏与道真有关写卷古代修复浅析》，《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3期，第25—31页。

②白居易：《香山寺新修经藏堂记》，中华再造善本《白氏文集》第十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78页。